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圣叹死后，其言其行，每被好事之徒，据耳食余闻，妄加渲染，甚至移花接木，误甲作乙。“丁祭弹文”的刘冠金戴，实乃此种余波所及。我们在研究金圣叹时，对此不可不察。如果不辨明史实，甚至对史料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或把金圣叹贬得一文不值，或给金圣叹戴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的高冠，都是脱离实际的。

①《广笑府》卷一。
②《古今月刊》第四期。
③《都公谭纂》卷下。见《砚云甲乙编》。
④《滁州志》卷七。
⑤《国宝新编》第十一页。见《纪录汇编》第一〇四卷。

春蚕吐丝　至死方尽

——悼谢国桢先生

任　道　斌

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谢国桢先生不幸因病去世。惊闻噩耗，使我悲痛难已！

谢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曾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明清史，回忆近几年来，先生以古稀高龄操劳教务，谆谆善诱，诲人不倦，对我们青年史学工作者热情帮助，悉心培养，没有半点的架子和丝毫的保留。我们撰写论文，从选题到史料的出处,先生都一一进行指点,甚至千方百计帮我们寻找、借阅资料。尤其令人难忘的经是过十年动乱，先生体弱多病，步履蹒跚，却不辞劳苦，带领我们调查考察，奔走南北，访求史料；稍有余暇，即伏案挥毫，分秒必争，著述不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竭尽了晚年的全部精力。谢老对科学的孜孜以求，对事业的乐观坚定，使我们非常感动。今年五月，先生积劳成疾，住院治疗。八月底我去首都医院探视，他老人家已能起床柱杖散步，并审阅某校教员的职称评定表。看到谢老久病初愈，我们都很高兴，盼他能早日康复，继续指导我们学习。谁知数日之后，先生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竟遽然长逝，我们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良师！如今“瓜蒂庵”（谢老书斋名）内人去房空，然而先生音容笑貌，却萦于脑际，宛若目前，每一思及先生对我们的指导，不禁人琴之感，为之黯然！

谢国桢先生诞生于一九〇一年，河南安阳人，祖籍江苏常熟，号刚主。少年时他就酷爱文史，但因家境不佳，只念了几年私塾，便辍学谋生。后经刻苦自学，于一九二五年考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毕业后赴天津，协助梁启超先生编撰《中国图书大辞典》，并兼任梁先生子女的家庭教师。在“饮冰室”中，受梁先生教益颇多，从此走上了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在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不分寒暑。解放前，谢先生还在北京图书馆、南京国史馆、云南大学等处任职。

一九四九年春，谢先生毅然离开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投奔解放区。经范文澜同志介绍，进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尔后，执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七年调入中国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明清史研究。十年浩劫中，谢老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度下放干校劳动。“四人帮”粉碎后，先生虽年近八十，仍壮心不已，除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外，去年又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顾问。今年二月，先生冒寒南下，去上海、苏州采访古籍，鉴定善本。直至住院前几天，仍兴致勃勃地给青年研究人员讲授明史和两汉碑刻。先生的晚年，勤勤恳恳，锲而不舍地忘我工作，犹如春蚕吐丝，至死方休！

先生从事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达五十余年，编撰的学术著作有四百多万言，在历史研究中，成绩卓著。特别在明清史籍、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谢老的治学旨趣，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的研究。进入清华不久，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明季奴变考》。一九三四年又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以后陆续发表《清初东北流人考》、《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与张献忠》、《试论李定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略论明代农民起义》、《清初利用汉族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等论文。在研究明清之际阶级关系上，谢老是首先对“奴变”、“东北流人”问题进行讨论的学者。解放后，谢老力图以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方法对农民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发展作科学的研究，《略论明代农民起义》，就是一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范文。

二、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谢老对明清学术文化史尤有兴趣，专门对清初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颙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个人际遇作了研究，然后再讨论他们的学术渊源和学术地位，力求避免无的放矢，撰成《顾宁人学谱》、《黄黎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此外还发表《张南垣父子事辑》、《平景孙事辑》、《彭茗斋著述考》、《陈则震事辑》、《漫谈明清时代的版画》、《耶苏会士利玛窦、巴多明等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学风》、《评价杨慎滇程记、滇载记》、《清代杰出的史学家全祖望》、《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记宣南诗会图卷》等论文。先生认为明嘉靖时学者杨慎，其治学方法有肇清乾嘉学派之源的功绩。先生还认为，明清的学术文化、工艺美术，均与经济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可惜当他正准备对上述专题深入研究时，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三、明代经济史研究。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谢老对明代社会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除编撰《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外，又写成《记明万历四十八年的平价米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等文。先生认为明代嘉靖时期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开始呈现或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其特点是自发性，其弱点是所积累的财富不能用于再生产，因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迟缓曲折的。但是，这些积累的财富却对明代的文化发展有过一定的作用。

四、南明史研究。从三十年代起，先生就从事南明史料的考订与搜集工作，在积累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成《晚明史话》。一九五七年写成专著《南明史略》。这部书不仅论述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消长变迁，而且还对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进行研究，因此这是一部较为完整的明清政治变革史，也是目前史学界唯一的南明史专著。

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和清代文字狱的屡兴，使明清之际的史料大多遭到厄运。而有关清朝满族统治者先祖的历史，即从明永乐时努儿干都司的建立到明末努尔哈赤发祥东北的历史，向为清廷所纂改，有关清初抗清运动史

料，亦是散佚零乱，几近湮没。在梁先生的启发下，谢先生深感研究明清之际这段历史是史学工作者不能忽视的，就利用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便利，于一九三三年撰成《晚明史籍考》。这部书几乎包罗万历至康熙的全部主要史籍，成为研究明清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柳亚子先生曾誉之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按籍而稽，可获“事半功倍”之效。此书后来两次增订、再版，蜚声中外。不久，先生又著《清开国史料考》。谢先生很赞成鲁迅所说“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中国的灵魂”，他对明清笔记的研究从未间断。许多善本书经先生的鉴定、介绍而得到妥善的保存，先生的研究心得有《丛书刊刻源流考》、《三省矿防考跋》、《明清笔记谈丛》、《明清史料研究》、《明清笔记概述》、《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等。这些成果大多经过修订辑入《明清笔记谈丛》出版。六十年代起，谢老开始编纂《明清笔记资料类编》，“文革”时这项工作受到干扰，但谢老并不因“四害”的猖獗而放弃对事业的追求，一有机会，就重整旧业，以乐观的态度坚持研究。粉碎“四人帮”后，八十余万言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相继问世，给明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方便。谢老还把晚年南北奔走访书所得，写成《锦城访书记》、《江浙访书记》，对“文革”以来新发现的明清笔记稗乘，作了专门的研究。

谢老应邀到过北师大、北大、川大、厦大、华师大等校讲授史料学，积数十年经验，他认为必须把史料学与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治好明清史，因为明清史料不仅卷帙浩繁，而且版本亦较其他断代史为复杂。为了给有志于治史的青年提供治学经验，去年谢老在旧讲稿的基础上撰成《史料学概论》，论述史料来源、目录学简史、史学与金石考古等关系、古籍的辨伪与辑失诸问题，交付出版。

六、汉碑和汉代社会的研究。谢老解放前曾任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对汉代的金石拓片做过搜集整理的工作，以后也没有放弃对此的注意，收藏许多珍品。从河南干校回京后，先生通读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有关史书，开始蕴酿着汉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并以汉代碑刻拓片所反映的历史为基础，陆续撰写单篇论文，发表于香港《文汇报》“艺林”副刊上。以后又写成《两汉社会生活》一书。

纵观先生的治学旨趣，可以用“博”、“深”二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深”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记得先生曾这样说过：“我以为研究历史，或者是研究学术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识，把当日的情况融会于胸臆之中，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然后再细致地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样才会对历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事实上，先生这番话亦是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在和谢老相处的日子里，我们还感到先生学风的民主，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即使学生的观点与他有分歧，只要言之有理，他都予以赞赏。先生经常教育我们要刻苦学习，不要辜负党的培养。他常常对人说：“我深深体会到，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离开了党和群众，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还为“生于社会主义盛世”而感到自豪。去年，郑重地决定把平生搜集、珍藏的数万册图书、碑帖全部献给国家，并将三万元奖金悉数交给历史研究所，作为明清史研究经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谢老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却是永存的。我们坚信，在党的

十二大路线指引下，谢老生前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历史科学，必将更加繁荣，更加发达！

访平南王尚可喜遗迹

李治亭　　佟铮

今年四月中旬，我们与辽宁大学历史系孙文良副教授一行三人，专程前往辽宁海城考察尚可喜史迹。尚可喜生于海城、长于海城、死后也葬于海城，他的后世子孙至今仍生活在故乡的土地上。

此次考察，我们先到南关的三学寺，该寺始建于唐代，为海城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这里藏有尚可喜驻节海城时刻立的一块碑，可惜现已断为两截，碑文多有损坏。该碑文为尚可喜亲撰，记述他于崇德二年春率吴进功、许尔显、许尔陞、班志富等四副将和参将任友达"同捐鹤俸（白银）"重修三学寺，到崇德六年完工。此时正是明清松锦会战前夕，他"从伐明，攻锦州"，于戎马倥偬之际，欣然命笔属文，刻碑纪念。虽叙修庙事，但寓情志于其中，所谓"庀材复奠鸿基"，表达了他的远大志向。后因"代远年湮，碑既摧残"，他的后代于光绪四年又重新刻立。但碑记证明，尚可喜于崇德六年所立碑，为有清一代立于此寺的第一块，它也是尚可喜在海城难得的实录。

据尚可喜第十一世孙尚世白同志说，尚可喜晚年曾把穿戴的冠服靴袜，作战用的宝剑弓刀等物，分赐诸子作为永久纪念，以不忘先人创业艰辛。例如第二十一子尚世琨得到一张弓，传至尚世白，此物不知下落。有一子分得一口青龙偃月刀，重达一百二十斤，一般人都拿不动。

尚可喜死后，归葬海城，康熙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敕建"尚王专祠"，营造陵园，并派两名佐领负责守护和定期祭祀。据尚世白说，他的族兄尚世谓曾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墓被掘开，目睹墓内情况，尚可喜的灵柩分棺椁两层，厚达数尺，全部为木制。与尚可喜合葬的还有他的两位夫人。他们的遗体早已变成一堆白骨，但随葬的金银玉器冠服还保存完好。

最近我们发现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尚氏宗谱》。

《尚氏宗谱》（尚氏均称《谱书》，今从之）。奉尚生为始祖，至尚可喜为第四代。截至一九三九年最后一次修谱书，已传至第十四代，共历四百余年。《谱书》世系分明，井然有序。实际上，《谱书》是将尚可喜置于始祖地位的，他为尚家首次获得王爵，无疑倍受推崇。因此《谱书》形成以他为中心，往上追溯三代，往下则以他的三十二个儿子为系统，分支入谱。后人举行祭祀活动，都把尚可喜摆在首位，直到今天，虽无祭祀，但在尚氏族人的心目中，还是把他敬作始祖。《谱书》于二百六十多年中共修过五次，而始修于尚可喜。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康熙十四年，还亲自为首次编撰的家谱作序。第二次重修家谱，是在康熙五十三年；乾隆十七年修第三次，五十六年修第四次，伪满康德六年重修是最后一次。参与修谱的全是尚氏子孙，外人不得与闻。最后一次，集前四次之大成，除全部将原家谱内容收人，又补充了大量新材料，还附录了有关尚可喜家族遗迹，遗物的照片多幅。